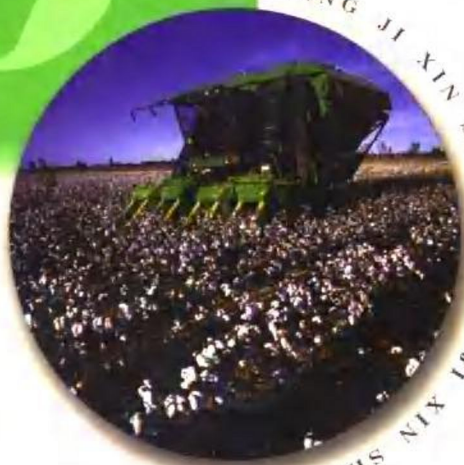


经济新视野



JING JI XIN SHI YE JING JI XIN SHI YE

曹阳 著

中国 农业劳动力转移： 宏观经济结构变动

Z G N Y L D L Z Y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宏观经济结构变动/曹阳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5
ISBN 7-216-02567-9

I. 中...

II. 曹...

III. 农业—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国

IV. F3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473 号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宏观经济结构变动

曹阳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64 千字

插页:4

版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10.50 元

书号:ISBN 7-216-02567-9/F·451

序 言

董辅初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地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由农村转向城镇,这是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正产生着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其重要,在我国已有不少著作对它进行了研究。曹阳同志的这本著作独辟蹊径,专门研究农业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对宏观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在我们读过他的著作后,一定会感到,这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是人们至今对它还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不够。实际上,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可以说,在从宏观层次上考虑我国的许多经济问题时,不能不把它纳入于考虑之中。

在现阶段,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两个互相交织的过程中进行的,这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环境。前一方面它是面临的经济发展的环境,后一方面的转移本身就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却会带来显著的影响。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俗称乡镇企业),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现在看来,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以转移农业过剩劳动力,可能是我国实现国家的

工业化的一个中间阶段,因为农村的非农产业逐渐向小城镇集中,最终会形成大小星罗棋布的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也就是说,最终还是会使农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当然在农村中还会留下一部分)。但是,至少在这个中间阶段,不能不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产生影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的制度环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制度环境,例如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城市户籍制度等等。它们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带来影响。无论是经济发展的环境还是制度的环境,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约束,形成了大量非永久性转移。这种约束最后会在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中打上深深的烙印。过去我写过文章比较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差异,其中就谈到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差异。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一般不举家迁移到城市,而印度农民则一般是举家迁移到城市,引致在城市郊区形成了巨大的一望无际的贫民窟,真正出现了西方所说的“城市漂流”的现象。中国农民一般不举家迁移到城市(本书概括为非永久性移民)就主要是受到制度的约束,特别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约束。这种情况自然会在宏观经济结构方面产生一系列后果。曹阳同志这本著作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从居民收入、宏观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等方面展开的。这些方面都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许多论述。特别有名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的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这个模型在观察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的工业国的转变过程是很有帮助的。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它不能不进行理论抽象,舍弃一些非本质的东西。但是,这个理论模式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均衡

理论为基础的,而在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情况与此有很大距离。把它运用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还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我国,这个理论模型必定会有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地方。例如,按照这个理论模型,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且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因此,在完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前,城乡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工资、实际收入是不变的。但是,实际上在我国,由于各种制度的约束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是不变,而是迅速增长。此外,西方经济学中的“持久收入假定”、“生命周期假定”和“绝对收入假定”也不太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曹阳同志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利用翔实的统计资料,既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成果,又不受其束缚,实事求是地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些与西方经济理论不同的新的结论。

在各种制度的约束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非永久性迁移在宏观结构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些是西方发展经济理论很少甚至没有涉及的。例如,正像曹阳同志在本书中所论述的,在那些非永久性迁移的劳动者中形成了既不同于农村居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型,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非永久性迁移的劳动者无形中成为连结城市与农村的桥梁,通过他们的中介,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型逐渐传导到农村居民。他们自身的消费模型将逐渐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型靠近,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又会向他们的消费模式靠近。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这些劳动力并未“归化”为城市居民,他们在城市中一般没有自己的固定住房和固定的职业,他们的消费模式仍会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不小的差别。曹阳同志在本书中还谈到的非永久性迁移对住宅、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消费品的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由于这些

劳动力到城市是非永久性迁移，不能不造成城市住宅需求的增长，同时又不会导致农村住宅需求的相应减少，很可能还会增加农村住宅的建设。而在城市中，由于这些非永久性迁移的劳动力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消费品的供给中很难予以足够的考虑，因此，城市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消费品的短缺势不可免。曹阳同志指出了这一点，无疑应该在城市建设中认真予以考虑。

非永久性迁移对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曹阳同志在本书中指出，这种非永久性迁移引起农村投资的非农化倾向，虽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资本深化”，但由于大量素质较低、收入也低非永久性迁移的劳动者涌入城市，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又引起非农产业整体的“资本浅化”。这种矛盾的现象也是很有意思的。至于非永久性迁移对地区结构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

曹阳同志这本书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结论，使得这本书与其他论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书有很大的不同，并对这方面的理论有新的推进，甚至可以说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我想，广大读者在读了这本书后会有同感。

这里，我还想指出，由于一些制度的约束，农业劳动力的非永久性迁移在我国还会继续下去，但我们也应看到，有些约束性的制度（如户籍管理制度）正在悄悄地变化。有些城市已经在实行“蓝色户口”的制度。同时，在转移到非农产业、特别是城市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中，有些人已经在非农产业、特别是在城市的非农产业中有了固定的职业。同时，在他们的收入中，他们从家庭承包的土地上所取得的收入已经变得微不足道，或者说无足轻重。虽然这些人目前还不多，但他们的人数会增加。也就是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的约束正在削弱，虽然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这些约束仍会存在,但制度的变化必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使一些非永久性的迁移变成永久性的迁移,或者半永久性迁移,即出现两栖现象,从而使得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也会有变化。当然,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本书的理论结论。

(1998年12月19日上午写于在京西宾馆参加“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的大会上)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本书的研究主题	1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本书研究的时空界定.....	6
三、知识经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面对的新挑战.....	9
四、本书的框架结构.....	13
五、本书数据的采用标准.....	14
第二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的制度约束	16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的特殊制度背景.....	16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微观经济主体(转移者)制度 约束下的行为假定.....	22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宏观经济主体(政府)制度 约束下的行为假定.....	32
四、小 结	40
第三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动	43
一、引 言	43
二、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实际工资不变”“消费 结构不变”假定质疑	44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贡献·····	53
四、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的影响·····	59
五、小 结·····	63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宏观消费结构的变动 ·····	65
一、引 言·····	65
二、双重二元制度结构约束下转移者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	66
三、职业转换对转移者消费模式及宏观消费结构变化的 引致效应·····	79
四、地域迁移对转移者消费模式及宏观消费结构变化的 引致效应·····	87
五、小 结·····	97
第五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投资结构的变动 ·····	100
一、引 言·····	100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转移者储蓄动机与投资主体 投资行为分析·····	101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投资非农化趋向·····	112
四、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资本市场及金融深化的影响 ·····	122
五、小 结·····	129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的变动 ·····	133
一、引 言·····	133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资 本浅化·····	134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乡镇社区企业的封闭性倾向 与私营企业家族化倾向	148
四、低素质农业劳力进城、城市非正规部门扩展与城市 产业结构变动	157
五、小 结	163
第七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地区经济结构变动	166
一、引 言	166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区域不平衡	167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东部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	179
四、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西部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	185
五、小 结	193
第八章 结 语	196
参考文献	205
后 记	211

第一章

导 论



一、本书的研究主题

狭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历史的跨度看,可以追溯至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而广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则可以追溯至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启端。在尔后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虽然一直没有完全中断,但限于分工分业的不发达以及各种自然和社会原因,这种转移难以形成足够的规模,以农业劳动力为主体的社会就业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

传统农业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都在从事农业生产。传统经济本质上也就是“农本经济”。农业社会也就是传统社会。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环节。正如 197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教授(1971,中译本 1985)所说:“对于我们正

在研究其经济增长的某个国家来说,在处理劳动力问题上,这种急速的转移是特别重要的。”“这种转移比率的加速,这种国内流动性更快的进行速度,是现代经济增长所特有的和决定性的特征。”^①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力剩余国家。这种劳力剩余不仅仅表现为城市日益显现的失业和下岗,更为严重的是广大农村有一大批过剩劳动力。他们以就业不足的隐蔽性失业为主要特征。这一大批“剩余劳动”的质与量如何界定,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其中较为典型的定义有两类。一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教授的定义,“剩余劳动”即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小于零的劳动。以此为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我把它称之为“绝对剩余劳动力”。按照这一定义界定,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在80年代末普遍估计为占农业劳力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即1亿左右。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陈吉元研究员在1989年写道:“保守的估计也显示出农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有些地区的40%,属于剩余劳动力。”曼格林博士不同意刘易斯教授的剩余劳动定义。他(1976)认为:“关于在一个劳动剩余经济中决定适宜的价格计算的方式,失业的基本性质不应该是失业者的零生产率,而应该是就业和失业之间边际生产率的差距;失业的边际生产率是否等于零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在服务业和农业就业的边际生产率小于他们在资本密集部门(例如工业)就业的边际生产率,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服务业和农业存在有隐蔽性失业。”曼格林定义的剩余劳动可看作是“相对剩

① H·钱纳里教授(1986,中译本1995)指出:“库兹涅茨在他的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中,将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确定为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

余劳动”。按照这一界定,我国农业剩余劳动的规模要更大。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见拙著《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基于体制变迁的分析》第三章。毋庸置疑,通观世界历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有我国如此庞大,转移的任务有如此艰巨。同时,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乡村迁移到城市或城镇,这种超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必然会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既是广泛的,又是深刻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从经济理论史溯源,配第、斯密以及李斯特到马克思,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涉及到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配第在《政治算术》(1690)一书中最早揭示了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的内在动力是比较利益的差异,隐含了产业“软化”的思想。两个世纪以后,科林·克拉克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著名的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尔后进一步由第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转移。

克拉克(1940)写道:“从威廉·配第爵士时代到现在,劳动人口从基本生产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过程一直在继续,也许还要继续几个世纪。”“我们从能得到的事实中十分小心地概括出来的道理表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伴随现象……是劳动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商业和服务业的活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译本 1979)中敏锐地观察到分工以致分业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推动力,由此出发可引申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必要性。斯密(1979)指出:“耕作小农地的乡村织工,由织机转到耕地,又由耕地转到织机,一定要虚费许多时间。”由此推论,为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

率,耕者与织工就应分工分业。

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一书中则从另一个角度,即农业人口压迫耕地的“推力”角度,论述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农业时期新增就业人口全部投入农业生产,致使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形成了农业的所谓“残缺”状态;这迫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农业时期也将演进到农工业时期。另一位德国社会统计学家恩格尔则从需求方面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恩格尔认为,食物开支占家庭收入开支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伴随收入的增长而下降。依此推论,人们收入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会相对减少。马克思(1867,中译本1972)从更深的制度层面论述了剥夺农民的土地,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强制性农业劳动力转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具有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农业中具有潜在的过剩人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不仅会相对地下降,而且会绝对地减少。“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

当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就

从动态的经济发展转向了新古典的静态均衡。^①农业与非农产业在制度结构上视为无差异的同质部门,因此,专门研究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意义。正如钱纳里(1986,中译本 1995)所指出的,在新古典竞争均衡假设下,“需求变化和部门间的资源流动则被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因为所有部门的劳动和资本都能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本世纪 40 年代,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较系统地阐述了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再次赋予了专门研究的特殊意义。在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中,隐含有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具有结构性差异的前提,因此,二者对劳动力需求的弹性也具有差异。在工业化的扩张经济中,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明显大于农业,这必然引致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刘易斯教授于 50 年代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以及费和拉尼斯对这一模型的扩展,其核心与枢纽就是剩余劳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传统农业与现代非农产业被视为是具有制度差异的非同质部门,在非均衡条件下,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正如夏振坤教授(1994)所说:“劳动剩余由传统的农业部门移向工业部门(泛义的工业部门),是发展问题的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国,当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由于我国特殊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发展中农业大国的国情,农业份额

^① “经济思潮的主流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转变,即由古典主义经济学把经济进步视为由累积力量形成的动态模式的看法,转变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的特别关心。”(Meier, G. M., 1984)

下降、尤其是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这一“发展的主题”(周其仁等,1984)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成为近三十年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众多经济文献(包括笔者的一些论著和论文)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速度、方式及内部运行机理等极其广泛的内容作了大量的、较为全面与系统的分析。相比之下,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则显得研究的系统性不够、研究的力度也不够。然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整体看,毕竟是一个宏观问题,而非微观问题。它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宏观经济的运行无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现阶段尤为如此。基于这一考虑,本书力图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这一目前研究较为薄弱但又极为重要的领域作一些探索性的工作。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本书研究的时空界定

本书所研究的时空领域是一个确定的有限的区间:“中国现代化进程。”更为严格地说来,这里的中国仅指中国大陆,这无疑是中国的主体。“现代化进程”着重点是进程,这表明本书研究的范围不是一个静止的时点,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时期。问题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握这个时期:它的质的规定性,它的起点和终点。

现代化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概念,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定义。罗荣渠教授(1986)认为,现代化“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各个

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这一定义强调的是历史进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于工业化。然而,工业化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工业化如同张培刚教授(1991)所定义的,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显然不仅仅是指工业,而且还包括“工业化了的农业”。不过,在西方及我国的众多文献中,工业化往往作狭义的理解。例如,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1983,中译本1988)把工业化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发展工业作为总的发展战略”。这一辞条的撰写者对这种工业化战略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评,“这种战略实施的结果是:只有少数国家取得成效(特别是实施出口鼓励的国家),大多数国家则陷入经济混乱而令人失望”。在西方大多数文献中,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工业化一般被等同于优先发展工业。美国经济学家迈耶(1984)曾写道:“一个发展规划,不能只着重工业化而牺牲农业的发展。虽然许多欠发达国家在他们起初的发展计划中,都集中于深思熟虑的工业化,但现在正在对工业化的作用重新进行认识和评价。”这里的工业化显然是狭义的工业化。

换一个角度,从国际经验去比较观察,从制度结构去分析,工业化确实有两种不同类型:一是与市场化相伴随的工业化,一是反市场化的工业化(曹阳,1994)。前一种类型的工业化,自然而然地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这源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推动;后一种类型的工业化则由于制度的障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十分迟缓,形成“工业净产值的高比例同农业‘就业’的高比例,十分罕见地长期并存”(周其仁等,1987)。笔者曾经指出:“反市场化的工业化与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很显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市场化